

罗马尼亚高校跨境语言教育的经验及启示：以克卢日-纳波卡“巴贝什-博尧伊”大学为例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徐台杰 董希骁

提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如何在教育机构内部处理跨境语言事务，直接关系到语言问题的解决、语言权利的维护，以及语言资源的开发。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巴贝什-博尧伊”大学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多民族地区，该校在欧盟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发展目标制定了极具特色的学校语言政策，采取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德语三条教学线齐头并进的融合式多语教育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基于语言资源视角对该校的成功经验加以分析，并尝试为我国高校跨境语言教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提供建议。

关键词：罗马尼亚；跨境语言；语言资源；机构语言政策

1 引言

跨境语言是分布在不同国家中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戴庆厦, 2016),存在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们作为多功能的综合性战略资源(朱艳华, 2016),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的重要研究对象。对跨境语言的有效管理可以改善族际关系、维护地区稳定及促进区域融合,因此在各级教育中合理使用跨境民族

语言即为管理措施之一(何山华, 2018)。学校作为落实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主体, 在处理跨境语言事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东欧地处不同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 地缘版图在历史演进中屡屡变更, 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时常错位, 形成诸多跨境民族。冷战结束后, 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成为中东欧各国“回归欧洲”的硬指标。在此背景下, 罗马尼亚愈发重视跨境民族语言教育, 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位于该国西北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克卢日-纳波卡“巴贝什-博尧伊”大学(Universitatea "Babes-Bolyai" din Cluj-Napoca, 以下简称 UBB)在欧盟政策框架内, 依托自身语言资源优势制定了极具特色的机构语言政策, 平行开设以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德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位项目, 执行多语培养方案, 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本文从语言资源视角出发, 分析 UBB 在跨境语言教育方面的特点与经验, 旨在为我国高校挖掘跨境语言资源、优化多语教育模式提供参鉴。

2 语言资源视阈下的跨境语言研究

Ruiz(1984)认为, 将语言视作问题、权利抑或资源, 是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 当前国内外针对跨境语言的研究亦多立足上述三个视角。

国际学界起初从语言问题视角出发, 认为多语社会无法避免语言问题(Mackey,1979), 且会因此失去凝聚性(Hufstedler,1980), 由跨境语言使用和传播引发的民族问题还可能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和国际冲突(Barbour et al.,2000)。基于

语言问题视角，政策制定者多鼓励或强迫小族群体转用主体民族语言。语言权利视角则与之相反，强调学习与使用母语是跨境民族的基本权利之一，是个体与集体认同的基础，应通过多种方式完善语言本体建设，并扩大使用范围(Mar-Molinero,1994; Neville,2009),但这种视角有时忽略了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上述两种矛盾的取向相互博弈，难以孕育出平衡有效的语言政策。相比之下，语言资源取向可以有效缓解此类矛盾，实现多民族多语言的和谐共存。积极的跨境语言资源规划有助于实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跨国融合，是构建想象共同体的有效途径(Valle,2011;Ndhlovu,2013;Portoles,2015)。

我国学者熊玉有(1999)、袁善来和康忠德(2014)、郭龙生(2016)等从问题取向出发，强调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分析其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影响，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权利视角的研究多着眼于全体少数民族，认为语言权利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保障(郭慧香，2013;何山华，2015),应在法律层面明确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内涵和规范(李德嘉，2019)。语言资源视阈下的研究认为跨境语言可以提升国家多语能力、推动国际经贸、助力文化传播(朱艳华，2016;张四红，2020;阎莉等，2022)。鉴于其具有多种功能和价值，学界主张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和有效利用跨境语言资源。教育作为语言资源保护和建设的重要途径，逐渐成为讨论热点之一。目前，我国民族地区跨境语言教育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包括缺乏聚焦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政策、未充

分利用跨境语言资源优势、教材和师资不到位等(宋歌, 2021)。为此, 有学者呼吁在保障国家通用语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重视跨境语言文字的保护、普及和推广(刘希瑞, 2018), 在我国跨境语言双语地区开展双向式双语教育(安丰存, 2018)。

综上, 语言资源观主张通过资源建设的方式来保障跨境群体语言权利, 缓解语言冲突和矛盾, 从而促进多民族社区的融合与发展。《"巴贝什-博尧伊"大学语言政策》(以下简称《UBB 语言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依托该校所处地区的语言资源优势制定的,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UBB 语言政策》解析

3.1 《UBB 语言政策》溯源

"巴贝什-博尧伊"大学是罗马尼亚最负盛名的高校之一, 其所在地克卢日-纳波卡(以下简称克卢日)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核心城市。该地区在历史上几经易主, 民族构成比罗马尼亚其他地区更为多元。除罗马尼亚族外, 当地还居住着大量操匈牙利语的匈牙利族人和赛库伊族人, 以及操德语的日耳曼族(萨斯)人。罗国家统计局 2022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匈族为该国第一大少数民族, 人口约 100 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 6%左右, 主要分布在特兰西瓦尼亚。此外, 该国还有约 2.3 万日耳曼族人, 同样以特兰西瓦尼亚为主要聚居区。克卢日的高等教育可追溯至 16 世纪末, UBB 的前身则是成立于 1581 年, 以拉丁语为教学语言的克卢日耶稣会高等学院(Colegiul Major Iezuit din Cluj)。由于领土归属的变更, 该校历经分合, 教学语言也在罗语和匈语之间反复摇摆, 但总体上坚持单一

教学语言的原则。1959年，采用罗语教学的维克托·巴贝什大学(Universitatea Victor Babes)和采用匈语教学的博尧伊大学(Universitatea Bolyai)合并，使整合多语教育资源成为可能。

1990年后，罗马尼亚社会全面转轨。为早日“回归欧洲”，该国依照欧盟政策框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机制，并形成了“隔离式”和“融合式”两种语言教育模式。前者常见于基础教育阶段，匈族背景的政党常以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主张母语权利，有时为拉拢选民不惜诉诸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将这种权利与国家通用语的普及对立起来(董希骁，2021)⁵⁵。专门针对少数民族、使用单一教学语言的隔离式教育往往会导致学生国家通用语水平欠佳、同主体民族融合困难、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在院校自主权更大的高等教育层面，融合式教育拥有更为广阔的平台，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收益，UBB即典型的例子。1995年，该校正式确定建设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三条教学线，2014年颁布的《UBB语言政策》则标志着多语教学理念的制度化和多语资源建设的规范化。

3.2 《UBB语言政策》的制度框架

制度框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基本原则**：确立多语制教学模式和国家通

用语主体地位；**(2)多语能力培养方案**：规定落实基本原则的具体路径；**(3)机**

构设置：为培养方案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3.2.1 基本原则

学校依据《UBB 语言政策》,秉持国际化与多元文化发展理念,倡导在人才培养、成果发表、内部交流和对外推介时平等使用当地常用的罗语、匈语、德语,在教学科研活动中亦鼓励使用英语等国际通用语,以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除罗语外,各院系可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申请开设以匈语、德语或其他国际通用语为教学语言的专业。其实行的"多语制"特指融合式多语制,而非教学线各自为营的隔离式多语制。不同民族的学生可自由选择专业教学语言和外语科目,共同上课,各教学线之间亦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在践行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理念的同时,《UBB 语言政策》也重视保障国家通用语的主体性,在相关条文中通过显性或隐性的表述确保罗语的使用。例如,所有涉及课程内容的文件都须用罗语和教学媒介语编写并公布;学校举办的会议建议使用所有参会者均能理解的语言;学校所有行政公文必须使用罗语。

3.2.2 多语能力培养方案

落实上述基本原则的前提是学生具备较强的多语能力。为此,《UBB 语言政策》制定了多语能力培养方案。本科阶段,学校遵循欧盟方针,实行"1+2"语言教育政策,即"母语(L1)+2 门其他语言(L2、L3)"。在 UBB 就读的罗籍学生母

语(L1)以罗、匈、德语为主。L2 为必修,一般为国际通用语言(现行方案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学生需在中小学阶段积累一定的基础,以适应本科阶段更高难度的学习。L3 为选修,可根据院系建议,在学

校课程涵盖的语言中选择任何一种。依据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学校建议学生在罗、匈、德三种地区常用语言中选修一门作为 L3。针对具体某一门语言的学习，UBB 实行分级别、定制化培养。学生入学时经测试，依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以下简称《欧框》)等级分入不同级别的学习小组，此后必须修习至少两学期的语言课程。各院系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外语课的具体学时和教学安排。

出于保障国家通用语主体地位的目的，《UBB 语言政策》要求校内相关部门在非罗语母语群体中积极推广罗马尼亚语言文化。这一工作由罗马尼亚语言、文化与文明系，以及罗马尼亚语作为欧洲语言研究所这两个机构负责，主要任务

包括：(1)依据《欧框》提供各等级罗语课程，提升和评估非罗语母语学生的

罗语水平；(2)通过各类课程和课外活动推广罗马尼亚文化；(3)通过硕士项目、模块化课程、实习实践等途径培养将罗语作为非母语/外语开展教学的人才；

(4)支持在罗语作为非母语/外语教学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涉及二语习得、教材编写、教具研发等方面，确保罗语教学和评估过程符合欧盟标准。

《UBB 语言政策》要求罗、匈、德语三条教学线围绕多语能力培养举办各类活动，旨在增进语言文化交流，并通过学分转换制度确保学生能修习用其他语言讲授的专业课程，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提升语言能力。

3.2.3 机构设置

为高效建设跨境语言教育资源，UBB 在领导和执行层面均专门设置了组织机构。以匈语线为例，其领导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1)匈语线理事会：作为匈语线决策机构，负责制定该教学线相关的规章条例，把握其发展方向；(2)校

务委员会匈语线小组：作为匈语线利益代表，向校务委员会呈交提案；(3)匈语

线分管副校长：在各类活动中代表匈语线。

在执行层面，匈语线各专业依照领导机构部署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同时，语言类院系、非语言类院系及现代语言中心三方协作培养学生多语能力。文学院①须为全校学生提供语言课程，根据各院系要求确定课程内容和学时，并在所有课程结束后评定学生语言等级。另外，文学院还应依据需求分析、教学讨论和诊断测试的结果调整课程内容，并通过设立科研项目来支持语言学习活动、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师发展。非语言类院系亦须通过各类举措提高学生多语能力，例如，要求学生阅读其他语言撰写的专业文献、参与用相关语言举办的讲座和会议、赴境外交流学习等。《UBB 语言政策》规定该类院系应出台实施细则，并建议将执行情况列入教职工绩效考核。现代语言中心负责提供符合《欧框》标准的课外语言培训，作为已有教学内容的补充。

3.3 《UBB 语言政策》的实践与成效

UBB 的跨境语言教育政策经多年实践，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专业建设方面，以 2021—2022 学年为例，该校总共 22 个院系中的 17 个设有以匈语为教学语言的专业，包括 67 个本科专业(60 个全日制专业，7 个远程教育专业)和 46 个硕士专业(均为全日制);8 个院系设有德语教学项目，包括 9 个本科专业和 6 个硕士专业(见图 1)。匈语线和德语线的本科专业数量总和约占罗语线专业数量的 50%，其硕士项目数量也已超过罗语线硕士项目数量的 30%。同时，该校还积极利用海外师资为跨境语言教育项目提供支持。2020—2021 学年，共有 131 名匈牙利教师和 56 名德国教师受邀协助 UBB 开展教研工作。在课程设置方面，UBB 在设计培养方案时既保障了各语言线教学内容的统一性，亦兼顾不同民族学生的需求。同一专业在各教学线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部分人文社科类专业兼顾跨境民族文化内容，额外设置了相关课程。以匈语线历史专业为例，除了与罗语线相同的课程外，还包含匈牙利民族前现代史、匈牙利民族现代史等富有该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课程。

在学生来源方面，UBB 确保招生的开放性，各类跨境语言教育项目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亦接受罗族学生报名，罗语教学线同样如此。此外，该校的跨境语言教学线对邻国学生也有一定吸引力。以匈语教学线为例，2021—2022 学年共有 302 名匈牙利籍学生在该校就读，较 2015 年(220 名)增长近 40%，这些学生多选择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

在社会评价方面，UBB 在多类高校排名中居罗马尼亚大学之首，跨境语言教学线功不可没，不少相关项目培养的人

才高度契合市场需求。例如，信息学(德语)作为德语线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培养了一批同时精通信息技术和德语的复合型人才，颇受市场青睐。恩梯梯数据(NTT DATA)、保时捷(PorscheAG)及其旗下的 MHP 咨询公司长期为该专业提供经费，2021—2022 学年资助总额达 6 万欧元。相关专业的校企融合度在该国首屈一指，MHP 公司和 NTT DAT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亲自讲授部分专业课程，提供业界最新的知识与案例，从而提高了德语线的办学水平。

4UBB 的成功经验

UBB 在跨境语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同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对多语多民族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坚持，以及对扩大高等教育影响力的尝试紧密相关。

4.1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UBB 的多语、多民族融合式教学历史悠久，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872—1918 年，该校前身之一匈牙利皇家费伦茨·约瑟夫大学 (Magyar Kiralyi Ferenc Jozsef Tudományegyetem) 虽然实行全匈语教学，但已采用多民族融合模式，面向匈族、罗族、日耳曼族招生。其间在此学习的 4 万名学生中有 1.2 万名获得毕业证书，包括 2,600 名罗族学生。1919 年 10 月 1 日，该校转制为用罗语授课的“斐迪南一世国王”大学 (Universitatea "Regele Ferdinand I"), 二战期间暂时外迁，1945 年迁回克卢日。同年，罗马尼亚当局在克卢日创建了一所用匈语教学的国立大学——博尧伊大学，以纪念两位匈族数学家——博尧伊·法尔卡什 (Bolyai Farkas) 和博尧

伊·亚诺什(Bolyai János)。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斐迪南一世国王”大学于次年更名为维克托·巴贝什大学，以纪念罗马尼亚细菌学家巴贝什。1948—1959年，两校除法学院有过合作外，基本保持独立办学模式。

1959年，巴贝什大学和博尧伊大学在罗政府的要求下合并，并继续保持多民族融合教学传统。1959—1960学年该校在校生共4,502人，其中罗族3,159人、

匈族1,285人、日耳曼族36人、其他民族22人。此次合并客观上开启了多语教育资源整合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罗马尼亚社会开始全面转型，UBB遵循欧盟多语制框架开展治理。1995年，该校启动罗、匈、德语三条教学线的系统建设，进一步落实多语、多元文化理念。

4.2 践行欧盟语言政策，坚持多语教育原则

在罗马尼亚，几乎所有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都必须与欧盟制度框架相符，与语言治理相关的法规亦不例外(董希骁，2021)³。高校语言政策与欧盟接轨，有利于推动师生交流、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同欧盟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办学水平。

从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角度看，《UBB语言政策》体现了《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中与语言相关的部分条款

从语言能力建设角度看，《UBB语言政策》是遵循欧盟多语制原则制定的。多语制是欧盟语言政策的核心之一，欧盟委员会将其定义为：“社会、机构、群体或个人在每天的生

活中经常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能力；亦指在一个地理区域、政治地理区域或政治实体内，多种语言的共存”(转引自戴曼纯等，2017)¹⁰。UBB 设置罗、匈、德语三条教学线，执行“1+2”多语教学方案，有助于学生掌握地区常用语言及国际通用语，进而满足其日常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多语需求。

4.3 积极开展对外推介，服务国际教育需求

近年来，在 UBB 匈语线就读的罗籍学生人数整体平稳，增长潜力有限。为打破生源瓶颈，推动项目进一步发展，该校积极开展对外推介，吸引留学生就读。服务国际教育需求成为其优化专业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多数罗籍匈族人并不排斥学习国家的官方语言，甚至有强烈的罗语学习愿望。Sandor(1998)指出，“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只有掌握双语，他们才能在其生活的国度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少数民族很明白这一点，因此都想让其子女尽可能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匈族人会说不愿学习罗语”。因此，相当一部分匈族学生在综合考虑后选择罗语教学线项目，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也就导致匈语线生源规模难以持续扩大，发展前景受限。

在此背景下，UBB 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创新内部举措，将国际部分教育需求转化为自身生源。就外部条件而言，欧盟鼓励成员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客观上打破了高校跨国招生的壁垒，该校提供的跨境语言教学项目则使得相关国家学生赴罗留学的语言门槛不复存在；就内部举措而言，该校借助

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在匈牙利吸引当地学生报考。例如，匈语线分管副校长和师生代表每年都会参加在布达佩斯举办的 EDUCATIO 国际教育展，通过发放传单、手册和播放宣传片等方式向匈牙利学生推介该校。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在 UBB 就读的匈籍学生数量连年上升，反过来也促进学校积极完善跨境语言教育资源，其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因此不断得到提升。

5 启示与建议

在欧盟和本国语言政策框架内，UBB 通过制定专门的机构语言政策来统筹各部门力量，丰富跨境语言教育资源，从而实现了和谐的多民族融合式教育。文秋

芳(2017)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共同构成。我国一些边疆民族语言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相近，是宝贵的跨境语言资源(文秋芳等，2018)，对其加以挖掘和利用，是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宏观目

标与罗马尼亚不尽相同，但是在微观的机构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该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亦可作为攻玉之石。现结合 UBB 的实践经验，对我国高校的跨境语言教育提出三点优化建议。

5.1 细化顶层设计，通过资源建设保障权利、消解矛盾

基于语言资源观，通过教育机构做好对跨境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预防和化

解语言矛盾，还能推动我国多语人才资源库的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拥有跨境语言教育资源的院校亦可参鉴《UBB 语言政策》，基于对供需关系的深入分析，为民族语言事务主管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框架内制定适合国情、地情和校情的机构语言政策。在确保国家通用语地位的同时，可鼓励设置用跨境语言讲授的学历项目或短期课程，通过教学线融合与多部门协作达成分类型培养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罗马尼亚高校并无成体系出版教材的传统，多依靠教师自选参考书目、自编讲义开展教学。尽管《UBB 语言政策》要求教学内容描述需配有罗马尼亚语版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管作用，但固定教材的缺位依然是一大隐患。一个国家的教材体系体现着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①我国需加强整体规划，注重对跨境语言教材编写、使用和评估。

5.2 采用融合式教育增进民族团结

《UBB 语言政策》要求罗、匈、德语三条教学线通过融合式教育践行多语制理念，促进了各族学生对彼此语言和文化地了解。我国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边疆地区部分汉族家庭受营商等因素影响，同样存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需求。例如，延边地区部分非朝鲜族家庭尝试把孩子送到朝鲜族学校就读，这一自发性的双向式语言教育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各民族的深度融合(安

丰存等, 2017)。因此, 拥有跨境语言教育资源的高校可酌情放宽对各族学生选择专业或课程的限制, 采用融合式、多向式教育模式提升个人多语能力、增进族际文化交流。

教学语言本身并不是造成民族矛盾的根源, 与之相比, 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具敏感性。除前文提及的教材建设外, 我国还应培养更多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者, 在学生和教师层面同步实现多民族、多语言的融合, “全员、全程、全方位”掌控育人内容, 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3 辐射周边地区, 促进民心相通

大量吸引留学生是《UBB 语言政策》的一大亮点, 这也为我国扩大高等教育

影响力提供了新思路。我国文化底蕴深厚, 教育传统悠久,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有能力为来自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有志于来华学习, 并深入了解中国。尽管国际中文教育成绩斐然, 但语言壁垒依然存在。为此, 很多高校设立了用国际通用语(以英语为主)授课的留学项目。同理, 设置用跨境语言授课的长短期留学项目, 可大幅降低相关国家学生的入学门槛, 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培养知华、友华青年, 同时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我国高校在这个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以跨境语言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内蒙古大学和延边大学为例, 目前尚未设置专门针对蒙古国或朝鲜、韩国学生, 用蒙古语或朝鲜语授课的留学项目。今后若能依托融合式教育模式, 使中国各族人民和外国留学生在同一个

课堂中学习，不仅可以营造和谐的族际、国际教育氛围，为“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打好基础，也是我国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

参考文献

安丰存, 2018.“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语言活力与双向式双语教育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6-64.

安丰存, 赵磊, 2017.跨境语言双语教育对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基础作用——以延边地区的朝汉双语教育为例[J].东疆学刊(3): 74-78.

戴曼纯, 何山华, 2017.多语制与后里斯本时代的欧盟法律一体化的障碍与出路——以刑事司法领域为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16.

戴庆厦, 2016.跨境语言调查的方法论问题[J].华夏文化论坛(1):159-164.

董希骁, 2021.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郭慧香, 2013.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公平性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4):170-173.

郭龙生, 2016.从生态与安全角度研究中国的跨境语言[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12-20+96.

何山华, 2015.中东欧转型国家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保护研究[D].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山华, 2018.国际跨境语言管理: 现状与趋势[J].语言战略研究(4):19-30.

李德嘉, 2019.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提出与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5):20-23.

刘希瑞, 201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84-188.

宋歌, 2021.民族地区跨境语言教育的新思路——论结构性问题与策略分析[J].社会科学家(9):156-160.

文秋芳, 2017.国家话语能力的内涵——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6-72.

文秋芳, 张天伟, 2018.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熊玉有, 1999.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149-156.

阎莉, 文旭, 2022.基于语言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跨境语言规划: 框架与意义[J].山东外语教学(1):26-37.

袁善来, 康忠德, 2014.中越跨境语言与边疆安全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4):152-156.

张四红, 2020.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J].语言文字应用(2):27-36.

朱艳华, 2016.论跨境语言资源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3):204-208.

BARBOUR S, CARMICHAEL C.(eds.). 2000.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FSTEDLER S M, 1980.On bilingual education, civil rights, and language minority regulations[J].NABE journal,(1): 63-69.

MACKEY W F, 1979.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 48-53.

MAR-MOLINERO C, 1994.Linguistic nationalism and minority language groups in the "New"Europe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4): 319-328.

NDHLOVU F, 2013.Cross-border languages in southern Afric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J]. African studies,(1): 19-40.

NEVILLE A, 2009. Evolving Africa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ACALAN project[J]. Language matters,(2): 117-132.

PORTOLES J B, 2015.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in Europe[M]. Brussels:Centre Maurits Coppieters.

RUIZ R,1984.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J]. NABE journal,(2):15-34.

SANDOR S,1998.De ce nu-si pot insusi copiii maghiari limba română in scoală?[J]. Altera,(7): 131-148.

VALLE J D, 2011.Transnational languages: beyond nation and empire? An introduction[J]. Sociolinguistic studies,(3): 387-397.

作者简介

徐台杰，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助教。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与规

划、外语教育、中东欧社会文化。电子邮箱：xutaijie@bfsu.edu.cn。

董希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罗马尼亚语语言文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dongxixiao@bfsu.edu.cn。

(责任编辑：张虹 王伶)